

李培林

李培林论文选



理论界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中国出版集团



中华书局

李培林论文选

李培林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培林论文选/李培林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9.1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ISBN 978-7-101-06498-8

I. 李… II. 李… III. 社会结构-中国-文集
IV. D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0692 号

-
- | | |
|-------|---|
| 书 名 | 李培林论文选 |
| 著 者 | 李培林 |
| 丛 书 名 |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
| 责任编辑 | 余 瑾 |
| 封面设计 | 惠 岩 |
| 版式设计 | 毛 淳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9年1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张24¼ 字数319千字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6498-8 |
| 定 价 | 51.00元 |
-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出版说明

实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推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重要举措。实施这一工程,旨在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政治坚定,与党同心同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一流的思想理论家、一流的记者编辑主持人、一流的出版家、一流的作家艺术家。为集中展示“四个一批”人才的优秀成果,发挥其示范引导作用,“四个一批”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编辑出版《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文库》主要收集出版“四个一批”人才的代表作,包括理论专著论文、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作品等。按照精益求精、分步实施的原则,《文库》将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统一封面设计陆续出版。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8年12月

作者简介 | 李培林

1955年5月生,山东济南人。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1984年获法国里昂大学硕士,1987年获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索邦大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1992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3年被授予“回国留学人员成就奖”。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发展、社会结构、企业组织和社会政策。主要著作有:《就业与制度变迁》、《新社会结构生长点》、《村落的终结》、《中国社会分层》、《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报告》等;另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等书。曾获得“全国第一届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社会学研究》十周年青年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十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并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

目 录

一 社会转型研究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	2
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23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	38
中国经济改革的“特色”	56

二 社会分层研究

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	75
再析新时期利益格局变动中的若干热点问题	98
中国贫富差距的心态影响和治理对策	122
消费分层: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视点	132

三 企业组织研究

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	
——对中国 10 个大城市 508 家企业的调查	150
网络化:企业组织变化的新趋势	
——北京中关村 200 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	171

四 就业研究

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	
——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	193

老工业基地的失业治理:后工业化和市场化

——东北地区9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调查 219

走出国有企业的人员过密化逻辑 240

中国就业面临的挑战和选择 254

五 乡村研究

中国百年来乡村工业化的道路与模式 270

中国乡村里的都市工业 322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 340

巨变:村落的终结

——都市里的村庄研究 364

一 社会转型研究

李培林论文选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转型的标志是: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等等^①。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从理论上做进一步的阐述。

人们一般认为,就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力量而言,存在着两只手:一只是有形的手——国家干预,一只是无形的手——市场调节。实际上,由于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一个结构转型时期,并且中国经济处于含义更加广泛的非平衡状态,因而对于中国来说,还存在着第三只手,即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就是社会结构转型。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整个社会转型时期,结构转型作为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将以它特有的方式规定着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资源配置的方向,这种力量用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都是无法概括的。在一般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推动力,而在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过程中,这种力量的作用日趋明显。

2

一、社会转型的概念界定

(一) 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

在描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时,“增长”和“发展”这两个概念常常被交替使用。在很多场合,它们是可以互相替代的。然而,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区别,代表着两种发展观。

^① 参见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

经济增长指的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提高。只要一个国家的商品产量和劳务量相对于人口增长来说提高了,就可以把它看作经济增长了。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阶段,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在理论上也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传统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主旨就是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数量增长为目标。这个时期在理论上出现了较有影响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罗宾逊增长模型、贫困恶性循环论、大推进理论等等。联合国在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中,也规定了不发达国家的基本发展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不低于6%。1969年应世界银行的要求提出的皮尔逊报告以及1970年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所提出的廷伯根报告,也都代表了这种传统发展观,即认为经济的增长是发展的捷径,只要把蛋糕做得大一点,就可以有更多的剩余分配,从而最终消除贫困现象。此外,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在殖民体系崩溃以后继续享有传统的原料供应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也动用各种手段把第三世界纳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并希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效果能够有“示范效应”。基于这种背景,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理论界存在着普遍的“增长热”,报纸、广播和政治演讲中充满了各种关于经济增长的词汇。

但是,到7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出现“滞胀”的困难局面。不可再生的资源大量消耗,片面增长带来环境的日趋恶化,受害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战后几十年的实践表明,单纯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真正消除贫困,而且由于发展的畸形,造成贫富悬殊、利润外流、债台高筑、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等等。平民教育、社会福利、医疗保健、生态环境、社会公平等社会进步因素都被当做经济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在此情况下,曾经一度在欢快的气氛中十分响亮和时髦的“增长”一词,似乎突然蒙上了悲观的色彩。

“无发展的增长”这句名言大概是对以上状况的精辟概括。它表明,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应该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社会保

李培林论文选

障、医疗保健、社会秩序等各个方面,其中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是发展的最本质内容。

(二)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

在描述社会转型的理论中,“传统”是一个被用滥了的术语。它往往被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类型,与落后的、不发达的、静止的状态相联系,从而带有贬义。与传统相对应的另一端是现代社会,一切先进的、发达的、动态的特征都被归于这种类型。所以说,在西方古典的现代化理论中,把社会结构的类型分成对应的两极是一种“通病”,如梅约的身份社会和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社会和“有机团结”社会、莱德弗尔德的民俗社会和都市社会、韦伯的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贝克的宗教社会和世俗社会,等等。所有这些社会类型二分法学说最终得到一种经典的概括,社会被归结为“传统”与“现代”两种基本类型,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门槛,只有一朝跨过才能进入现代社会。

事实上,在所有这些理论中,人们对“传统”的界定往往是十分含混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家们习惯于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的理想类型,然后从这种类型的反面去推导传统社会的特征,似乎传统与现代之间是泾渭分明的,而在所有那些被称为“传统”的东西中,最具有传统特征的又是价值观、行为规范、心理状态、信仰等非经济因素或非物质文化。近三十年来,东方一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对这种“思维定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东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已经达到发达或较发达的水平,但他们的民族精神、人际关系、组织管理方式和文化氛围等都还是很“传统”的,被称之为“东方特色”。与此同时,一些拉美国家和中东石油输出国,虽然建起了外观非常现代化的城市,有豪华的宾馆和出售高级奢侈品的商店,甚至人均收入也比较高,但人们仍普遍认为他们并不属于现代化国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现代化的因素并非是与自

身文化传统的完全决裂,而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因为如果从深层意义上来理解,传统本身就是一个蕴涵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积淀过程。古典现代化理论家由于在理解社会结构的含义时偏重于狭义的文化和囿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所以他们的某些结论往往背离了他们的初衷。

我们说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型变动,这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它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其他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二是指它是持续发展中的一种阶段性特征,是在持续的结构性变动中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顾问钱纳里在提出结构转换概念时所说的,“在描述经济发展的过程时,我们试图用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换这个概念,取代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二分法概念”^①;三是指它是一个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是由一组结构变化的参数来说明的,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宏观描述和抽象分析,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将做更加深入的探讨。

(三) 社会转型是一个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

事实上,把数量分析引入对结构性变动的考察,这标志着人们对结构问题的一种重新发现。

注重社会结构和事物的空间安排,这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的兴趣。但直到进化论出现以前,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对社会结构的探索仍主要是一种静态研究。社会学的创立使人们把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与社会过程联系起来,即在研究社会运行过程中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动。但是,那时人们的主要关注点是探索历史表象背后的统一规律。亚当·斯密在经济领域发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无疑是这种努力的重要结果,同时也为推动这种努力打了一针兴奋剂。但自此以后,人们对“统一规律”(如结构变动的三段式逻辑)的探索都没有超出抽象分

^① 钱纳里等著,李小青等译:《发展的格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47页。

李培林论文选

析和经验观察的局限性。

直到本世纪^①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才在社会领域对结构问题重新有所发现。这种重新发现的标志之一,就是把数量分析引入对经济社会结构的考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在1966年推出《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他通过对大量历史统计数据的模型分析,对经济增长中的产值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国际依赖关系等诸方面的变动,都进行了多国之间的比较研究。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还对社会结构的经济特征相联系的非经济特征(如人口格局、政治结构、文化特征、社会整合程度等)尽可能地进行了数量分析^②。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论,从另一个方面引起人们对结构问题的重新关注,他从研究“劳动力剩余经济”入手,考察了“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相互联系^③。他用结构分析方法建立的二元经济模型,已成为人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结构变迁和转型的重要理论框架之一,这种理论框架对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劳动力转移、收入分配结构等具有特殊的意义。

事实上,把数量分析引入对经济社会结构的考察是对传统—现代二分法的一个有益补缺,因为它可以使更清晰地看到经济社会结构不同层面的变动时序和具体的变动轨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更具代表性的是钱纳里的研究。他正是通过经济增长长周期的数量分析在理论上把结构转变和工业化过程紧密地联系起来。早在70年代初,钱纳里根据掌握的统计资料,对100个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在战后20年中(1950—1970)的经济结构变动趋势进行了数量分析。他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把发展过程分为从人均100美元到人均1000美元9个阶段,然后考察每一阶段上经济社会的10个方面共27个相关

① 本书中凡涉及“本世纪”,均指20世纪;“上世纪”均指19世纪,编者注。

② 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编著,戴睿、易诚译:《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③ 参见阿瑟·刘易斯著,施炜等译:《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

变量的变动趋势,以期了解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具有的结构变动特征。这 10 个方面被分成三大类:一是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二是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构成、生产结构和外贸结构;三是人口变化及分配过程,包括劳动力构成、城市化、人口变化和收入分配^①。

从 60 年代初开始,社会学家也在探索以数量指标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动。那些描述现代化社会结构特征的数量指标,一般被称为社会结构转型的“临界点”。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 A. 英克尔斯在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6 个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抽样调查后,提出了现代化国家结构特征的 10 项指标。这个指标体系除选用了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外,还包括了成人识字率、大学生占人口比重、人口净增率、平均预期寿命等一些公认的重要社会指标,从而反映了社会发展观在近几十年中发生的深刻变化^②。

从以上我们对社会转型的概念界定中可以看到,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二、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点

社会结构转型并非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特有现象,而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在历史背景、文化背景、资源背景等方面的特殊性,使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表现出若干不同于一般发展进程的特点。

(一)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步进行

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在其他国家的现

① 参见钱纳里等著,李小青等译:《发展的格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年,第 9 页。

② 参见 Inkeles and Smith, *Becoming Moder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李培林
论文选

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转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直接的动因是经济改革,这是确定无疑的。

首先,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促成各种新要素的产生和导入。在体制要素方面,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所有制结构,改革了原有的高度集权的组织体制,使生产管理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价格体制、分配体制、外贸体制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规范要素方面,初步建立起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规范体系。这特别是指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市场的扩大使资源的流动性显著增强,以职业分化为主体的各种社会分化成为必然趋势,并随之产生各种新型经济—社会组织和职业群体。新的规范体系已不再是以管严管死为内在要求,而是以资源的合理流动为前提。在技术要素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引进各种先进技术两万多项。在社会变迁中,技术是一切新要素中的主导要素。因为技术的发明创造所改变的,并不仅仅是生产能力,它会使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发生变化。关于这点,只要看看近十几年来家用电器的迅速普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就会一目了然。在观念要素方面,商品观念、效益观念、时间观念、法制观念和社会参与等观念的形成,使人们的总体价值观念迅速变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在拥有广播、电视、电影、广告、报纸、书刊、电话、传真、电脑网络等现代信息传载手段的社会中,这些新要素的产生和导入得到迅速的传播、扩散和生长,从而使社会结构在各个层面都发生或快或慢的变化。

然而,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从另一面来看,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旧的传统体制已被打破,社会现实在一些深层次上发生变化,过去的某些社会整合方式已不再适应现实的要求,而新的社会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新旧两种社会体制,秩序规范和机制的并存交替局面将会持续一个较长时期,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摩擦、矛盾和冲突会在一定时期内表现得异常激烈。另外,体制改革的过程从根本上说也是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在这种调整过程中,多数人会从改

革中获益,但也有一部分人会暂时失去一些利益;放权分权的过程会使一些组织和个人失去原有的权力;在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由于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裕起来,会使另一部分人的相对收入地位下移。加之在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由于体制不完善而产生的利益分配不公等现象,都会使利益差距拉大的同时伴随着各种利益摩擦和冲突。与此同时,在结构转型时期,各种结构性要素都处于变化之中,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过渡性和不稳定性。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经济层面与社会层面之间、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之间,都会出现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最后,功能分化的加强和持续,社会流动的增加,社会晋升渠道的多样化,这些都使人们的身份和角色处在一种变动的状态,从各个层面上表现出一种“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往往使个人和组织丧失对自身角色及其角色规范的认同,陷入经常性的角色冲突中,如企业所陷入的作为行政主管部门下属和市场竞争主体的矛盾,乡镇企业工人所呈现的农民户籍身份和工人职业身份的矛盾等等。

总之,在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同步进行的情况下,结构冲突、角色冲突与体制摩擦、机制摩擦、利益摩擦等互相交织在一起,互相牵制,增加了结构转型的难度,也使情况更加复杂化。人们在处理各种冲突中,往往顾此失彼,投鼠又忌器。

(二)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启动

在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中,政府和市场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推动力量,但是这两种力量的巧妙结合,的确是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范例。我们在前面已指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最直接动因,由于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也可以说它是最根本的动因。从政府的作用来看,经济体制改革是由党和政府发动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并随之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新秩序,制定了一整套的改革方

案,改革开放始终表现为一个倡导、宣传、试点、推广的过程。另一方面,从市场作用来看,由于改革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直接表现为市场作用的扩大。在调节供求关系和资源配置方面,市场已逐步成为主要的力量,而且市场已不是作为个别、单一的因素介入经济社会生活,而是逐步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基础产品方面建立的商品市场以及在资金、劳动力、土地、技术、信息等方面建立的生产要素市场,已经使市场的作用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市场机制一旦导入,市场体系一经建立,就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愿望为转移,从而使结构转型成为一种不可逆趋势。

我们发现,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巧妙结合,得益于三方面的条件:一是顺乎民心民意。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说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要求,而且“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这些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都是人民群众在求生存、求发展过程中的伟大创造;二是坚持使大多数人获益的原则。尽管改革是复杂的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很多方面的利益差距会拉大,但由于坚持使大多数人从直接的经济增长中获益,普遍地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使经济改革获得广泛的支持,也大大增强了人们对结构转型和体制变动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三是顺应结构转型的历史潮流,坚持在实践中探索和不断总结经验,调整政策。政府主动的不断“纠偏”,取消那些与市场机制作用相抵触的做法,政府干预不再作为一种超经济的强制力量,而是作为对市场的有效补缺。

在目前世界各国的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已越来越成为人们谈论的主题^①。在这些谈论中有两种较为流行的观点:一是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二分法,这实际上是把两者有形或无形地对立起来,看成两种相互背离的力量,主张市场决定论的一方往往把政府干预斥为国家强制,而主张政府干预的一方

^① 世界银行的专家们在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的绪论中说:“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本报告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第1页。